



政府机构与美国早期农业农村社会学的兴起

马学军

[摘要] 农业农村社会学是美国社会学中较早兴起的分支学科,其兴起过程离不开政府机构的支持。本文考察了美国内战时期农业部的成立及其科学化风格,进步主义时期“乡村生活委员会”与农业农村社会学的诞生,以及两次世界大战期间“农场人口和农村生活处”的专业化领导与知识生产,分析了美国政府机构对早期农业农村社会学兴起的重要意义。研究指出,美国政府在内战时期开始干预农业农村事务,初期形成了科学化和专业化的施政风格,由专家学者担任部门机构负责人,此后广泛与各院校开展合作协议,培养农业农村社会学的师资力量,拓展农业农村社会学的研究主题,开展农业农村的服务活动,不仅促进了早期农业农村社会学的发展,也为政府制定公共政策提供了重要的信息数据。

[关键词] 政府机构;农业农村社会学;科学化;专业化

DOI:10.13240/j.cnki.caujsse.20240724.005

一门学科的兴起和发展,离不开学科自身的学术传承,也离不开社会经济环境的推动。知识治理是现代国家治理的重要方式,国家力量对现代学科发展的影响不可忽视。福柯在经典的《治理术》中指出,西欧国家的治理概念自16世纪发生重要变化:从作为主权的治理转变为作为经济的治理,治理的目标从维护国家主权转变为增加国民财富;治理的对象从国家领土转变为与人关联的财富、资源、领土(地理、气候、灌溉条件、肥沃程度的领土)、行为、饥荒、疾病、死亡等,人口成为治理的最终目的;治理的方式从依靠司法、行政转变为越来越依靠各种知识形式,即对于人口的各种观察资料和分析知识;这种治理知识(savoir)就是“对所有与人口(广义上)相关的过程(即我们今天称为经济的那个东西)的知识”^①。18世纪诞生的政治经济学,正是这种“治理知识”兴起的表现。

在18世纪的政治经济学流派中,最重要的莫过于重商学派和重农学派。尽管商业贸易成为此后现代国家经济财富增长的重要方式,但不可否认的是,农业依然是国民财富增长的重要源泉,农村人口也是国家人口的重要部分,在现代国家中依然占据

[基金项目]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项目“美国农村社会学的兴衰史研究及其对中国农村研究的借鉴意义”(19YJC840031)。

[作者简介] 马学军,中国农业大学人文与发展学院副教授。

① 福柯:《治理术》,赵晓力译,http://www.douban.com/group/topic/6230678/。

不可忽视的地位。

霍布斯鲍姆(2016:90-92)指出,尽管英国在18、19世纪的工业革命与商业贸易中独领风骚,其农业人口在工业化过程中不断下降,但农业在国家中的地位却依然十分重要。19世纪末20世纪初,美国也经历了从“农业社会”到“工业社会”的巨大转变,美国农业农村急剧变迁,出现农作物价格过低、农场破产、农村人口外流等众多问题,引起了教会、学者和政府的关注。与农业农村相关的农业经济学、农村社会学、农业社会学等学科也在此时兴起,国家力量在这些学科兴起过程中发挥的作用不可忽视。本文主要考察美国政府机构与早期农业农村社会学兴起的关系。

一、美国内战时期农业部的成立及其科学化风格

美国农业部(USDA)是美国联邦政府内负责农业和农村发展的行政部门,农业部部长直接向美国总统报告,是总统内阁成员之一。然而,美国农业部部长的地位并非一直这么高。事实上,“美国农业部迟至内战时期才设立,直到1889年农业部的最高长官也不称‘部长’,而是叫‘专员’,并且农业专员也不属于内阁成员。直到1889年,农业部部长才开始进入内阁,农业事务才成为总统关切的政务之一,诺曼·科尔曼是第一位升格为内阁成员的农业部部长。从那以后,美国政府才开始真正在农业问题上发挥积极的干预作用,才有了20世纪出现的大量农业立法和政策”(原祖杰,2023:345)。在美国内战时期,1862年由林肯总统签署通过的农业部创建法、《宅地法》(*the Homestead Act*)和《莫里尔法案》(*the Morrill Act*),推动了美国农业的发展,也深刻地影响了美国政府与农业的关系(Baker,1963:5)。

从殖民时代到19世纪末,美国主要是一个农业国家,农场主是美国人梦想的职业。农业试验在北美殖民地时期便已出现。美国独立以后,“一些农业州的农业精英开始自发地组织起来,成立了一些致力于农业改进的地方性社团,最早的一批包括费城农业促进会、南卡罗来纳农业及乡村问题促进会等。其中,费城农业促进会的通讯会员中包括托马斯·杰斐逊和乔治·华盛顿。作为弗吉尼亚州的大农场主,这两位前总统也都是农业试验的积极实践者”(原祖杰,2023:353)。然而,尽管一些个人和民间团体一直积极从事农业试验活动,但联邦政府自独立时就秉持“小政府、大社会”的理念,减少对经济和社会的干预,自然也尽量避免对农业农村事务的干预。不过,在内战时期联邦政府的一些政策在客观上推动了农业发展,尤其体现在1862年《宅地法》和《莫里尔法案》这两个法案上。

土地是农业和农村发展的前提条件。美国政府在内战时期通过的《宅地法》等法案,确立了对西部土地的国有原则和公共土地制度,土地成为联邦鼓励移民定居和农业开发的主要方式,西部土地中因此出现了大量的奖励性授地。“其中,支持内部改进的各种授地、教育授地和军功授地最为著名”(李剑鸣,2009:150)。在教育授地

中,最重要的计划当属1862年通过的《莫里尔法案》。该法案规定,“参照1860年各州人口基数,按每位议员3万英亩的比例给各州划拨土地,用于支持农业和技术学院的建设和发展。后来又通过了《第二莫里尔法案》(*the Second Morrill Act*),联邦累计划拨交易用地达9900万英亩之多”(李剑鸣,2009:151)。在这一法案的推动下,大量的赠地大学(Land-Grant College)兴起,在此后美国的农业科研、教育和推广中发挥核心作用,也孕育了此后美国农业农村社会学(谢彤华,2024)。不过,由于《莫里尔法案》并没有对如何开展农业教育进行具体规定,最初各赠地学校开设的农业课程不尽相同,且普遍面临师资缺乏、生源不足、设备缺少等困难(李素敏,2004:55-61)。

与此同时,美国政府开始开展与农业相关的活动,逐步建立相关农业部门。1837年,亨利·埃尔斯沃思(Henry Ellsworth)成为国务院专利专员,通过国会成员和地方农业协会收集和分发新品种的种子和植物。1839年,国会在专利局内设立了农业处,并拨款1000美元用于收集农业统计数据和其他用途。埃尔斯沃思要求建立一个公共储藏室来保存和分发各种新种子和植物,设立一个办事员来收集农业统计数据,编写不同地区农作物的州报告,以及将化学应用于农业,被称为“农业部之父”^①。1849年,专利局划归新成立的内政部。此后,随着搜集种子和农业统计的工作扩展,且这些工作与专利局的职能不再密切相关,越来越多的人请求国会将这些工作从该部门划分出去(原祖杰,2023:355)。

1862年5月15日,林肯签署农业部创建法,正式批准成立独立的农业部,负责开展与“农业、农村发展、水产养殖和人类营养”相关的研究和开发工作;林肯将其称为“人民的部门”,因为当时全国有一半以上的人直接或间接从事农业或农业综合企业^②。尽管成立了农业部,但当时正值南北战争,民众和舆论更关注战场形势,而非新成立的农业部,甚至一些观点仍然反对设置独立的农业部(Baker,1963:13)。新成立的农业部仅有八名员工,由一名没有内阁地位的专员领导。该部的行政长官称“专员”,而不称“部长”,也不入内阁,在美国政府中的地位依旧是“弱势”的。不过,这种边缘的处境反而使农业部有更多的自主空间,形成了科学化的行政风格。这种科学化风格,主要体现在部门设置、人员构成与事务活动三个方面。

首先,在部门设置方面,新成立的农业部在此前专利局的基础上,继续开展种子引进和农业统计工作,设立了统计处和育种处两个下属机构。国会关于农业部的总体目标和职责定位是:“获取并向美国人民传播与农业有关的最普遍和最全面的有

① Wikipedia: United States Department of Agriculture, https://en.wikipedia.org/wiki/United_States_Department_of_Agriculture。

② Wikipedia: United States Department of Agriculture, https://en.wikipedia.org/wiki/United_States_Department_of_Agriculture。

用信息,并向人民采购、繁育和分发新的、有价值的种子和植物”(Baker,1963:13)。新成立的农业部与埃尔斯沃思在专利局的工作重心基本一致,侧重农业种子的搜集、分类、种植以及对农业数据的搜集和统计。农业学家艾萨克·牛顿(Isaac Newton)被任命为首任专员,他是一位华盛顿附近成功的农场管理者,对农业试验和农业统计非常感兴趣。“他延续了专利局开始的农业年度报告,于1863年开始发布月度报告,并一直持续到1876年。其中一些出版物,特别是年度报告和月度报告,被国会大量分发”(Baker,1963:14)。

紧接着,根据实际需要,农业部增加了化学处、昆虫处、植物学处、微生物处、林业处、兽医处和瓜果处、鸟学类与哺乳动物学处。除了这些研究部门外,还建立了兼具资料存储和公共教育功能的图书馆和农业博物馆(原祖杰,2023:359-360)。1871年,托马斯·泰勒被任命为新成立的显微镜部负责人。泰勒在家乡苏格兰接受过科学训练,并在乔治城大学接受过医学训练。他热衷于开发显微镜在农业研究中的潜在价值,他所在的部门负责农业部所有使用显微镜的工作(Baker,1963:20)。最后一任农业专员诺曼·科尔曼(Norman Colman)担任局长初期,成立了三个新的部门:植物学部、鸟类学与哺乳动物学部以及蔬菜病理学部(Baker,1963:23-24)。从农业部的部门设置可以看出“农业部的功能与机构设置很大程度上与现代以来关乎农业的各门科学学科相对应。从研究属性来讲,农业部简直就是一个国家农业科学院”(原祖杰,2023:360)。

其次,在人事结构方面,“农业部的前两任专员,牛顿和霍勒斯·凯普伦,没有接受过大学教育,但两人都是成功的农场主,并且非常重视科学研究。从第三任专员弗雷德里克·沃茨开始,历任专员便都与农业科学或学术深有渊源了”(原祖杰,2023:360)。弗雷德里克·瓦茨(Frederick Watts)于1871年8月1日就职,时年70岁,任职共六年时间。他曾将地中海小麦引入宾夕法尼亚州,推动成立了宾夕法尼亚州农业协会,并积极参与了美国农业协会的组织工作,是宾夕法尼亚州农业领域非常杰出的人物(Baker,1963:19)。最后一任农业专员科尔曼曾任密苏里州园艺协会创始人和主席、密苏里州牲畜饲养协会主席、密苏里州博览会主席和密苏里州农业委员会主席(Baker,1963:23),也是农业领域中的杰出人物。此外,农业部各部门负责人更是由清一色的专家学者组成。“这些专家中,不少成了美国农业发展史上的重要人物,比如统计学家雅各布·道奇,从内战后到1893年一直担任农业部的统计师。农业部的第一代植物学专家威廉·桑德斯,曾留学爱丁堡大学学习园艺学,他与同样曾受农业部雇佣的奥利弗·凯利,是赫赫有名的农民组织全国格兰其的两位核心创始人”(原祖杰,2023:360)。可见,“从部门首脑到下属官员的这样一种人事构成,使得农业部在美国各行政部门乃至包括立法、司法机关在内的整个联邦政府之中,形成了别具一格的行政风格。这批人出身高等学府,身怀过硬的科学知识或技能,可谓是一群精英”(原祖杰,2023:361)。

最后,在政策方面,新成立的农业部加强了与赠地大学等农业教育体系的联系。在《莫里尔法案》的支持下,各地兴起的赠地大学开设了农业相关课程,如何将课堂教学与农业试验、农业实践有机结合,是赠地大学开展农业技术教育面对的重要课题。在农业部最后一任专员科尔曼的大力支持下,两项对美国农业具有重要意义的法律得以通过:第一部是为各州试验站提供联邦援助的《哈奇法案》(*the Hatch Act*);第二部是将农业部提升至内阁的法案(Baker, 1963:24)。1875年,康涅狄格州建立了美国第一个由州政府支持的农业试验站,但这种模式并未在全美各州得到推广。为争取国会通过联邦支持援助试验站的法案,科尔曼召集各学院和试验站在华盛顿举行会议,强调学院与农业部合作的理念,并敦促立法建立联邦政府支持的试验站。1886年,密苏里州的威廉·哈奇(William Hatch)向众议院提出的法案获得国会通过。1887年3月2日,克利夫兰总统签署通过。1888年10月1日,科尔曼根据新法案在农业部内成立了试验站办公室,作为研究项目和研究成果的信息交流中心(Baker, 1963:24-25)。

《哈奇法案》的通过进一步推动了美国农业教育的发展,也使农业部和农学院之间建立起稳固的合作关系,“美国农业试验站实际上构成了农学院知识生产的最关键的引擎”(原祖杰,2023:362)。《哈奇法案》要求“各州普遍建立试验站,广泛吸收农业院校的科技力量参加试验站的工作,以帮助在美国人民中获得和传播与农业有关的实用信息,进行与农业科学的原理及应用有关的科学调查和实验,并使美国的农业教育和科学研究工作结合起来。同意该法案规定的各州,每年可获得15000美元的联邦资助,用于支付实施调查、实验、出版和分发研究结果所需的花费。该法案同时要求州财政提供同样或更多的经费”(李素敏,2004:62)。试验站推动了各赠地大学农业教育和农业科研的相互促进。“随着试验站工作的进一步展开,各试验站和联邦农业部收集和验证的信息,有组织地进入赠地学院的课程,从而促使学院的教学内容不断丰富,学科分支越来越细;学院的师生,由于直接参加试验站的工作,既能提高教学质量,又能扩大研究成果,从而保证了学院的延续;试验站的工作也改变了学院的教学方法”(李素敏,2004:63)。

随着农业科学研究部门逐渐建立完善,农业部负责的农业事务范围日益扩大,美国国会不得不认真考虑将农业部长官从“专员”升级为“部长”。经过一番讨论,1888年9月,国会表决农业部行政长官被接受入阁;1889年2月,克利夫兰总统签署决议正式生效。农业部入阁具有划时代的意义,“政府这一举措,无疑是对来自内战以来农业部工作成就的肯定,同时也是对农业在美国社会生活中的重要性的确认……农业部长官入阁,也是美国政府对于连续不断出现的农民反抗潮流的一种回应。但光有外界的呼吁也是不够的,农业部的领导者及其官僚人员不断以专业化、科学化的精神来武装农业部的工作,这一点是更具决定性的”(原祖杰,2023:366)。

二、进步主义时期“乡村生活委员会”与农村社会学的兴起

内战结束后,美国的经济社会发展重心经历了从乡村到城市、从农业到工业的快速变革。此时,铁路和制造业的快速扩张,吸引了大量移民蜂拥而至,形成了大量的产业工人,并随之出现了劳工、移民、失业、贫民窟等社会问题。面对这些社会问题,一些协会和团体(例如教会组织、行业协会、大学生组织等)主张应用知识和技能改善社会。“这些新群体也乐观地相信,有责任感的公民在技术知识的帮助下共同行动起来,并且时常利用政府的力量,这将能够实现社会的进步,改善人类处境……到1910年时,许多人则直接简称自己是‘进步者’”(帕金,米勒,2013:436)。这一时期,到处盛行“改革”,许多个人和群体都参与了改革运动。1900—1917年也被称为“进步主义时期”,而罗斯福被称为“进步主义时代”的总统(帕金,米勒,2013:435-436)。

伴随着美国社会从“农业社会”到“工业社会”的巨大转变,美国农业进一步实现了机械化和商品化,农业生产力和农产品产量迅速提高。但是,农作物价格过低、农场衰落、农村人口外流等问题很快随之而来。农场主深受铁路公司、金融债务机构的盘剥,很容易陷入资不抵债的境地,大量农场主纷纷破产,出现“农场危机”。在进步主义的理念下,乡村问题成为美国全社会关注的重要议题。1908年,罗斯福宣布成立“乡村生活委员会”,负责支持和促进美国乡村社会。该委员会发布的乡村问题报告,不仅直接促进了美国乡村生活的重建,也催生了美国农村社会学的兴起。

该委员会的成立及该报告的发布,与时任美国农业部部长詹姆斯·威尔逊(James Wilson)、罗斯福的朋友霍勒斯·普伦克特(Horace Plunket)的参与密不可分。威尔逊自1897年就任农业部部长,任期长达16年,是历任内阁官员中任期最长的一位,期间经历了麦金利、罗斯福和塔夫脱三任总统。他曾是爱荷华农学院的农业教授和试验站站长,曾在艾奥瓦州议会和美国众议院任职。在国会的工作经验和人际关系为威尔逊推动相关农业立法通过提供了便利(Baker,1963:39-40)。普伦克特是爱尔兰合作运动的领袖,在乡村生活委员会成立过程中发挥了核心作用。他于1879年离开爱尔兰,后在美国怀俄明州的波德河区开始了牧场生活。1901年,在威尔逊的建议下,普伦克特和罗斯福见面交流,1905年再次见面,两人讨论了一个多小时的农村生活问题,特别是阻止农民从农场流向城市的方法;在接下来的两年中,普伦克特多次与罗斯福及其他华盛顿官员商讨改善美国农场生活的方法(Nelson,1969:9-10)。

1908年8月,罗斯福成立“乡村生活委员会”,他把这个委员会看作国家自然保护委员会的孪生兄弟,是国家对人的保护运动(Nelson,1969:9)。他任命时任康奈尔大学农学院院长的利伯蒂·贝利(Liberty Bailey)为主席。其他委员会成员包括马萨诸塞州立学院院长肯扬·巴特菲尔德(Kenyon Butterfield)、全国农民联合会主席查尔斯·巴雷特(Charles Barrett)等,普伦克特也是委员会成员之一(Nelson,1969:10)。

1908年11月9日至12月22日,委员会成员在全国30个城市举行了公开听证会,向约55万人邮寄了调查问卷,并由个别委员进行了特别询问和调查。在广泛了解不同意见后,委员会开始撰写报告,最终于1909年2月9日由总统提交给国会讨论(Nelson, 1969: 10-11)。

报告开篇总结了农村生活中的突出问题:农业技术知识不足;学校缺乏对农村生活的培训;河流和森林资源被垄断,大片可耕地被扣留用于投机;公路不足;土壤流失;缺乏良好的领导;信贷不足和劳动力短缺;农妇生活受限且负担沉重;缺乏公共卫生服务等。报告建议对农业地区进行详细而深入的调查,以为发展科学、经济的乡村生活提供事实依据,并提出了针对性的补救措施,尤其呼吁要关注乡村教育、组织和精神力量(Nelson, 1969: 11)。事实上,报告所指出的这些问题,贝利、巴特菲尔德等专家学者早已指出。不过,如果没有全国范围的听证会以及由总统提交国会最终发布,这些事实和观点就只有少数专家学者了解。报告发布之后,乡村问题引起了广泛讨论。“这份报告的意义在于,它是来自政府最高层的声音,描述了农村的状况,并提出了一系列改革建议。在当时,这个声音在很大程度上是闻所未闻的”(Nelson, 1969: 12)。此后,经济学、社会学家纷纷开始试图诊断农业农村问题,神职人员对乡村教堂和乡村生活的衰落感到震惊,人们开始意识到农业农村对国家至关重要。

委员会建议开展三大运动。第一项是调查运动,通过详细调查所有农业区域和乡村生活条件,详尽了解美国农业农村的现实状况,为乡村生活的科学发展提供事实依据。第二项运动是“乡村进步运动”,即通过举行地方、州及全国农村进步会议,成立相关协会以重建乡村生活,乡村学校运动和乡村教会运动是其重要的组成部分(Larson et al., 2003: 12)。第一届州乡村生活会议于1911年2月在威斯康星大学农学院举行。农业经济学家亨利·泰勒(Henry Taylor)担任会议主席,他后来成为农业部农业经济局(Bureau of Agricultural Economics, BAE)的负责人。查尔斯·加尔平(Charles Galpin)报告了他对农村社区研究的初步工作,他后来成为农业经济局下属的“农场人口和农村生活处”长期的负责人。第三项运动是建立全国性的推广计划,这一建议进一步推动了美国农学院和试验站协会合作想法的落实,其标志是1914年美国国会通过的《史密斯—利弗法案》(*the Smith-Lever Act*)。该法案授权联邦资助全国赠地大学的综合推广工作。这些推广工作具体包括“在社区给那些没能进入学院的人进行农业和家政的教学和实际示范,通过农场示范、出版物及其他形式,带给这些人农业和家政的信息”(李素敏, 2004: 96)。该法案直接推动了美国高校农业技术推广体系和推广服务的发展。

尤其需要指出的,该委员会的成立及该报告的发布,某种意义上催生了美国农村社会学的兴起。委员会发布报告之后,有迹象表明,农村社会学作为一个专门领域在美国社会学学科中兴起。报告发表后,农村社会学越来越多地开始在农业院校的教学和研究计划中占据一席之地,培养农村教师的师范学校开始开设农村社会学课程。

为了培训和拓宽农业院校的师资队伍,美国农业院校和试验站协会每年举办为期一个月的暑期“研究生班”,在1910年举办的培训班中,首次开设了农村社会学课程(Larson et al., 2003:13)。在1916年举行的美国社会学协会年会上,德怀特·桑德森(Dwight Sanderson)报告了他对农村社会学教学的调查,他发现31所赠地大学、9所独立的州立大学、30所师范学校和29所其他学院和大学都在教授农村社会学(Larson et al., 2003:13)。

在委员会成员中,巴特菲尔德不仅是倡导“乡村生活运动”的核心人物,也是第一位在农业学校开设农村社会学课程的教师,他的农村改革思想在当时美国农村产生了重要影响(陈焯广等,2023)。巴特菲尔德于1902年在密歇根大学首次开设了农村社会学课程,该课程后来被美国农业部试验站办公室评为农业研究生培训班中“最重要的事业之一”(Larson et al., 2003:13)。报告发布之后的几年,农村社会学的师资力量和教学研究不断扩展,从事农村社会学研究和教学的人员于1912年在联邦教会委员会主办的“社会服务与乡村生活”会议上首次会面,讨论农村社会学协会的成立。在首次会面的十几个人中,就包括加尔平和巴特菲尔德。他们决定尝试把“乡村生活”推荐为美国社会学协会年度会议的主题,最终在1916年获得了成功(Larson et al., 2003:12-13)。1917年,美国社会学学会正式成立农村社会学分部;1935年,专业刊物《农村社会学》创立;1937年,美国农村社会学学会正式成立。

可见,从1909年“乡村生活委员会”发布乡村问题报告到1917年美国社会学学会成立农村社会学分部,这期间美国农村社会学的学科力量逐渐兴起。这在某种程度上得益于委员会报告对乡村调查和乡村社会问题的强调,“必须承认乡村生活委员会的报告是建立农村社会科学的第一个重要里程碑”(Nelson, 1969:12)。不过,进步主义时期由罗斯福支持建立的“乡村建设委员会”开展的乡村生活运动,不久后随着美国加入第一次世界大战而中断。同时,委员会报告所指出的农村生活中的突出问题,例如经济衰退、农村凋敝等问题,很快就消失了。农村复苏明显,农业进入黄金期,直到一战之后大萧条产生新的经济困难(Nelson, 1969:12),乡村重建运动再次复兴,农村社会学得以再次发展。

三、两次世界大战期间“农场人口和农村生活处”的专业化领导

虽然美国参加一战的时间很短,但战后美国的农业农村生活发生了重要的变化。第一,此前衰落的美国农业农村逐渐开始复兴。在1917—1919年间,随着农产品价格上涨,农民收入大幅增长,农村人口持续增长。1920年人口普查显示,全国农村人口数量超过了城市人口数量,这是一个具有里程碑意义的转折点。此外,一战后,数十万退伍军人重新回到农场生活,农场租赁价格也不断攀升(Larson et al., 2003:15-16)。第二,战争时期美国农村社会组织持续扩大。一战时,各地合作推广人员

构成的系统成为政府与数百万农民密切联系的重要方式。为了支持推广工作,许多地方以不同的名称成立了农民组织,到1919年进一步联合成立了大型的综合农民组织(Larson et al., 2003:17)。第三,乡村重建的呼声再次兴起。1919年1月,以“乡村生活重建”为会议主题的第一届全国乡村生活大会召开,会上决定成立美国乡村生活协会(ACLA),被战争中断的“乡村进步运动”再次复兴。此外,与国际的联系也不应忽视。在1919年美国乡村生活协会第一次会议上,担任“国际乡村生活运动”委员会主席的巴特菲尔德也发表了报告,同年世界农业协会成立,巴特菲尔德担任主席(Larson et al., 2003:17-18)。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大卫·休斯顿(David Houston)担任美国农业部部长。自1913年3月6日休斯顿成为农业部部长以来,他力求让美国农业部“比以往更加关注影响农民的广泛社会和经济问题”(Larson et al., 2003:18)。1918年11月,休斯顿拟成立农场管理办公室,并成立委员会制定该办公室未来的工作计划。该七人委员会由农业经济学家泰勒负责。1919年2月26日,委员会提交了报告,为拟成立的“农场管理和农场经济局”推荐了七项研究工作,农场生活研究是七项研究之一(Larson et al., 2003:18)。1919年5月12日,加尔平被休斯顿任命负责新成立的“农场生活研究小组”,是“农场管理和农场经济学办公室”的研究部门。1922年7月1日,“农场管理和农场经济学办公室”更名为“农业经济局”(BAE),隶属于美国农业部;同时,加尔平负责的“农场生活研究小组”正式更名为“农场人口和农村生活处”(Division of Farm Population and Rural Life, DFPR),正式隶属于农业经济局管理,成为联邦政府内正式的机构。

从1919年“农场生活研究小组”成立到1922年“农场人口和农村生活处”正式成立,直到1953年该机构被取消,该部门在美国农业部中存续了34年。该机构是美国政府为农村社会学专门设立的第一个、也是唯一一个从事农村研究的机构。尽管“农场生活研究小组”成立之前,美国农业部内部和外部都有支持农村社会学研究的先例,然而1919年该机构的成立,是联邦政府第一次将农村社会学研究作为重点工作(Larson et al., 2003:11)。该机构存在的34年历史在美国农业农村社会学的发展史中具有独特的地位。“尽管它的工作人员和预算一直很少,而且在美国农业部的行政组织中处于从属地位,但它在发展和促进被称为农村社会学的专业领域方面发挥了领导作用。它是社会学实践的先驱”(Larson et al., 2003:1)。该机构广泛与各大学建立合作关系,资助大量研究项目(包括农村和农场人口的人口统计分析、农场家庭的生活水平、农村社会组织和社会结构以及这些系统的变化等),不仅为政府制定农村公共政策提供了重要的数据信息,也对促进和发展农业农村社会学的研究议题和研究方法发挥了重要作用。

作为一个组织机构,了解该部门的组织隶属关系和人事变动非常重要。该机构设置于农业经济局,意味着其命运自始至终都与农业经济局息息相关。国会先拨款

给农业经济局,农业经济局再拨款给该部门。“幸运的是,每位农业经济局负责人通常都是该机构强大而重要的支持者,有时还起到保护作用。每个人无一例外都是备受推崇的专业农业经济学家”(Larson et al., 2003:2-3)。农业经济局的前身是农业经济管理局。农业经济管理局成立初期,从威斯康星州、明尼苏达州和康奈尔州等少数几个提供农业博士学位的赠地大学招聘农业经济学家^①。休斯顿任农业部部长时,任命农业经济学家泰勒担任局长。1919年“农场生活研究小组”成立时,加尔平凭借他在威斯康星大学所做的开创性工作为这项任务做好了准备,成为泰勒眼中担任该职位的理想人选。泰勒在八年前就与加尔平合作,研究威斯康星州的乡村生活问题。在加尔平看来,该部门实现了罗斯福总统希望政府部门研究乡村生活需求的愿望,尽管时间晚了点(Larson et al., 2003:20-21)。

尤其需要注意的是,该部门受益于社会学家持续的专业化领导。该部门的领导层非常稳定,从1919年成立到1953年被撤销的34年中,加尔平和卡尔·泰勒(Carl Taylor)领导该部门共32年。这两位杰出的领导者,都具有社会学背景(Larson et al., 2003:25)。此外,在该部门存续的34年中,专业人员少至2人,多至57人。有超过140人在该部门整个生命周期中担任专业职务,其中大多数是社会学家,还包括一些文化人类学家、社会心理学家等(Larson et al., 2003:25)。

第一任负责人是加尔平,从1919年至1934年共担任该部门负责人15年。他是农村社会学的先驱,以推进农村人口、农村生活水平、农村社会组织和社会结构的分析研究而闻名。他的贡献超出了农村社会学的范围,还包括生态学和公共卫生方面^②。他出生于纽约州的汉密尔顿,是一个乡村牧师的儿子,家乡农村环境和宗教教养对他未来的职业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1911年,没有接受过正式社会学培训的加尔平被威斯康星大学农业经济系泰勒所看重,录用为一名教师。在准备教授他的第一门课程时,加尔平在图书馆中找不到农村社会学课本和合适的资料,他独立开展研究以获得未知领域的第一手资料,因而诞生了他的经典著作《一个农业社区的社会学解剖》,这是农业农村社会学研究的里程碑著作。

在这本书中,加尔平提出了很多有意义的问题,例如“是否有农村社区这种东西?如果有,其特点是什么?作为一个阶层的农业人口是否可以被视为一个社区?或者你是否可以从开阔的乡村中划出任何一块或大或小、或正方形、或三角形、或不规则形状的土地,将这部分土地上的农户视为一个社区,并为他们规划?由一个教会组织结合在一起的挪威人定居点会形成一个社区吗?每个农场是否都有自己的社区,不同于其他社区?普通乡村教育的社会结构是怎样的?”(Nelson, 1969:36-37)

^① Wikipedia: Economic Research Service, https://en.wikipedia.org/wiki/Economic_Research_Service。

^② Wikipedia: Charles Josiah Galpin, https://en.jinzhao.wiki/wiki/Charles_Josiah_Galpin。

这在美国农村社会研究的方法层面产生了巨大影响，“首先，在洞察力较弱的观察者看来，沃尔沃斯郡数以百计的农舍无差别地散落在各处，而现在，这些农舍已成为围绕村庄中心的联合生活模式。加尔平的方法，即使不是他的社区概念，也是一项真正的社会发明……其次，当时也有一些关于乡村社区的研究，但都未能发展出一种精确的描述方法……对于当时深思熟虑的观察者来说，开放式的乡村社区概念是显而易见的，但令人吃惊的是，很少有人试图用精确的术语来定义这种关系。加尔平将乡村社区定义为一个城市综合体，并提出了一种划分其边界的方法”（Nelson, 1969:37）。

此外，不论在华盛顿，还是在威斯康星州，加尔平都是农村生活的斗士。除了撰写公报、通告、研究著作，以及为乡村生活会议作报告外，加尔平对改善乡村生活也充满热情。他利用他的影响力，鼓励乡村居民组织起来，研究如何改善乡村生活质量，甚至使用国家和地区的广播媒体（Larson et al., 2003:26）。加尔平还活跃于国际农业领域。“1926年，他花了六个月的时间出差访问了13个欧洲国家。那一年，他还作为美国代表参加了在罗马举行的国际农业研究所大会和在布鲁塞尔举行的国际农村生活会议”（Larson et al., 2003:26）。

在加尔平领导时期（1919—1934年），该机构的人员和资金一直很少。在最好的年份，来自国会定期拨款的资金不到34 000美元，专业人员从未超过5人。当该机构开始运行时，美国还没有农村人口普查数据，更谈不上农民生活水平统计数据，关于农村社区社会结构变动的信息也很有限。加尔平的一大贡献是开始建立有关美国农村生活知识库，推动了三个领域的研究：农场人口（迁移、农场收益或损失、构成）、农村组织（农村地区的社区、邻里和特殊利益集团结构），以及农场家庭生活标准；加尔平的另一个贡献是成功地在众多赠地大学和其他大学中开展社会学研究，通过协议合作，培训农村社会学的师资力量。作为美国乡村生活协会第一任秘书，他于1923年和1924年兼任副主席，且一直活跃于美国社会学协会（ASA）的农村分部，1932年任ASA副主席，并于1934年退休（Larson et al., 2003:26）。

第二任负责人是卡尔·泰勒，从1935年接任加尔平到1952年长达17年时间担任该机构负责人。与加尔平不同，泰勒拥有博士学位，他的整个职业生涯都是以一名社会学家身份出现的。他在1918年于密苏里大学获得博士学位，1920年在北卡罗来纳州立农业与工程学院讲授农村社会学和农业经济学课程。他撰写的《农村社会学》是该领域较早的专著之一。作为一名社会学家，泰勒执掌该部门被视为“政府圈内有关社会学问题的中坚力量”（Larson et al., 2003:28）。和加尔平一样，泰勒在全美的农村社会学家中处于领导地位。他于1935年起担任美国乡村生活协会主席，并于1939年担任农村社会学协会第二任主席，1946年担任ASA主席。

在泰勒领导时期，该机构经历了大萧条的新政时期、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及战后时期三个重要阶段。在新政时期（1935—1941年），该部门的地位得到了显著提升。“对农业和农村了解和掌握的需求来自新的农业行动机构，例如农场安全管理局

(FSA)、农业调整管理局(AAA)和土壤保护局(SCS),也来自农业经济局(BAE)与土地授予学院合作发起的新的全国基层农业规划系统以及联邦政府的非农业机构,最引人注目的是内政部的垦务局”(Larson et al., 2003:6)。这些新的农业行动机构通过与“农场人口和农村生活处”开展合作,提供实验室和大量的研究资金,一方面获得了大量美国农业农村的数据和信息,另一方面也推动了该部门的扩张。这时期该部门的人员和预算达到了高峰,专业人员达到了57人,所有来源的拨款资金超过了40万美元,远超加尔平领导时期;这时期的工作人员主要由社会学家组成,同时增加了文化人类学家、社会心理学家、人文地理学家、文化历史学家和经济学家,逐渐形成了多学科的人员力量(Larson et al., 2003:5)。

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1942—1945年),国防问题成为国家重要议题,也重塑了该部门的工作。1942年1月1日,农业经济局宣布了整个局及其11个部门的战时工作计划,要求优先考虑“为赢得战争做出重大贡献的所有工作”。其中一个重要的主题是农业劳动力的研究,主要是通过该部门在农村社会组织方面的专业知识,协助组织农村社区进行战时活动。这项工作是和民防办公室、美国农业部战时委员会和其他机构合作开展的。此外,研究平民参与战争以及战争对农村生活和社区的影响也是该部门战时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Larson et al., 2003:6)。不过,还需要指出的是,战时需求的变化也导致该部门研究议题的大幅缩减,一些研究被放弃了,专业工作人员的多学科性质也逐渐减弱。到战争结束时,专业人员从新政时期的峰值57人下降到44人,年度预算也比之前的峰值缩减了三分之一(Larson et al., 2003:6)。

进入战后时期(1946—1953年),该机构的命运急转直下。“外部政治力量、国会行动、美国农业部高层的行政决定,以及将该部门命运与BAE命运联系在一起的结构,所有这些都导致了该部门的裁员,并最终导致该部门的撤销”(Larson et al., 2003:7)。早在1943年,由于农业部土壤保护局和农业调整管理局等多部门的联合反对,国会在1943财政年度的拨款法案中禁止将任何BAE资金用于州和地方土地使用规划,大大削弱了农业经济局的经费拨款。1946年1月1日,美国农业部取消了农业经济局所有相关的土地规划职能。1947年国会在财政年度的拨款法案中,将农业经济局用于经济调查的资金削减为50万美元,并下令关闭地区办事处,并禁止将任何资金用于“文化调查”。随之而来的裁员速度也很快,到1948年,专业人员减少到23人,大约是战争结束时的一半。由于对部门工作环境的恶化感到沮丧,该部门负责人泰勒于1952年6月退休。玛格丽特·哈古德(Margaret Hagood)接任该部门负责人,但一年多后的1953年11月2日,农业经济局以及下属的“农场人口和农村生活处”都被取消了(Larson et al., 2003:7-8)。

在该机构活动的34年中,加尔平和泰勒两位具有社会学专业背景的杰出学者持续领导该部门共32年,历经了一战后、大萧条新政时期、二战时期以及二战后四个阶段。虽然在这四个时期中该机构不断变化,但也有以下四个共同的特征。“第一,与

农业经济局一样,该部门的管理原则相信知识可以应用于解决或缓解社会问题的信念;事实上,成立该部门的宗旨是‘促进美国农民及其家庭生活的进步’;第二,另一项管理原则是:该部门与农业经济局一样,具有高度的专业精神,该部门的领导层及其大部分工作人员曾在大学担任社会学家职务。该部门寻求并保持与全国范围内的赠地大学和其他大学的工作关系。它的领导人活跃于专业社会学组织,并且它始终致力于开发和改进研究方法,并增加关于农村生活的有效知识。第三,该部门的计划总是以不同比例交融,既代表了它的应用方向,也代表了它对学科建设的兴趣。第四,该部门的领导层具有连续性优势,领导层受到同行的尊重。例如,泰勒被选为农村社会学协会和美国社会学协会的主席”(Larson et al., 2003:8-9)。

四、“农场人口和农村生活处”与农业农村社会学的知识生产

如果说进步主义时期罗斯福总统成立的“乡村生活委员会”直接推动了美国农村社会学的兴起,那么两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国农业部农业经济局下属的“农场人口和农村生活处”,在两任具有社会学专业背景的负责人长达32年持续而稳定的专业领导下,极大地促进了美国农业农村社会学的知识生产和学科发展。这体现在如下四个方面。

第一,该部门拓展了农场租赁、兼职农业、文化和农业、农业和社区、技术与农业等农业农村社会学研究主题的兴起。一战结束后,美国农业农村复兴,农场租赁价格不断攀升,加尔平即任时就立即着手开展研究“农村租赁”主题。1936年11月,罗斯福总统还任命了农场租赁特别委员会,以专门研究农场租赁问题(Larson et al., 2003:151)。“兼职农业”这一研究主题的兴起,得益于加尔平在1920年开展人口普查之后专门为八个县制作的农场居民表格。这些表格揭示了这些县的农场家庭成员从事非农工作的程度。这使得在1930年的人口普查中增加了这一项内容。调查表明,1929年全国600万农场经营者中有近三分之一的人平均离开农场工作一百天以上(Larson et al., 2003:166)。

“文化和农业”的研究主题兴起于20世纪40年代,此时该部门工作人员加入了一些文化人类学家,影响了当时的社区研究,将文化因素引入到农业问题研究中。早在1939年5月,农业经济局就主办了一次文化人类学会议,名为“文化与农业:与当前农业问题相关的文化人类学”。参与这次人类学会议的有芝加哥大学人类学家罗伯特·雷德菲尔德、芝加哥大学退休社会学家罗伯特·帕克等著名学者,以及来自农业经济局和其他部门的工作人员(Larson et al., 2003:156-157)。“农业与社区关系”的研究始于20年代初期,当时研究人员对具有不同农业系统的社区进行比较,讨论不同农业特征与这些社区最初定居时的宗教取向、信仰和价值观的关系(Larson et al., 2003:159-160)。“技术与农业”的研究主题在20世纪30年代开始兴起,关

注农业机械化和其他技术变革的快速发展对农业农村的影响。在该机构支持的少数几项专门针对农业技术的研究中,其中有一项是尝试测算1910—1945年国家及地区的农业技术进步率,以确定技术变革对美国农业结构的影响,尤其关注家庭农场(Larson et al., 2003:163-164)。

第二,该部门推动了1925年《珀内尔法案》的出台,将农村社会学确立为农业试验站的一门合法研究学科。1887年《哈奇法案》和1906年《亚当斯法案》为各州农业试验站的科研、教学和实践提供大量资助。不过,这两个法案并没明确规定各试验站应具体开展哪些研究,实际中各州试验站将联邦拨款的资金主要用于自然科学研究,很少用于社会科学研究。不过,20世纪20年代的农业萧条,使试验站人员很快意识到只注重生产而忽视经济与社会问题的研究是不行的。“大萧条使得市场与乡村社会问题变得比生产更重要。赠地学院遂转向国会请求支持,赠地学院协会起草了一个增加试验站资助的议案,1921年由印第安纳州议员珀内尔提交众议院。在一些农业组织的积极支持下,法案最终于1925年通过”(李素敏,2004:86)。可以说,《珀内尔法案》是一个突破,将农村社会学确立为农业试验站合法开设的一门研究学科。“该法案授权每年向各州农业试验站拨款,可用于‘以发展和改善农村家庭和农村生活为目的的经济和社会学调查’”(Larson et al., 2003:270)。

在《珀内尔法案》的出台过程中,加尔平领导的“农场人口和农村生活处”发挥了重要作用。“该部门参与了《珀内尔法案》的制定,因为该法案的倡导者可以利用加尔平的合作研究协议所产生的实例来说明,如果向各州持续提供用于社会学研究的资金,在改善农村生活方面可能会取得哪些成果。该部门还参与制定了新资金的使用准则。加尔平是美国农业部‘土地赠予学院特别委员会’的六名成员之一,该委员会就农业试验站优先考虑的研究领域提出了建议”(Larson et al., 2003:271)。法案通过后不久,试验站和联邦农业部同意在农业经济学、乡村社会学和生产等领域进行更广泛的合作研究。美国农业部试验站办公室管理的年度报告记录了农村社会学研究的进展情况。“1924年—1925年,即该法案颁布前一年,各州农业试验站共有34个活跃项目。五年后,共有46个项目。在1933年—1934年,报告显示26个州立试验站有60个活跃项目。在这26个项目中,有6个项目设有独立的农村社会学研究部门。试验站办公室主任说,农村社会学在许多方面都取得了‘非凡的进步’”(Larson et al., 2003:270-271)。这说明,该部门推动了出台的《珀内尔法案》,极大促进了农村社会学在美国的开展。

第三,该部门广泛采用科研合作协议,培养了各大院校农村社会学师资力量。1919年,加尔平任职该部门时,各院校对农村生活的社会学研究很少。他制定了一项合作研究协议,鼓励各院校的研究人员开展并扩大社会学研究。“加尔平在来到华盛顿后首次访问各州的农业学院时,明确了播下‘农村社会学种子’战略的总体思路。他认为‘每所农学院都应该有一个人,最后再配备一名教职员工,他们的工作就

是越来越深入地了解本州的农业生活……这些在各州负责农村生活的关键人物将成为联邦农村生活研究机构的眼、手指和耳朵”（Larson et al., 2003:269）。1920年,该部门与六所赠地大学试行了合作计划,每年又增加了几家,直到1924年该机构制定一项正式的合作协议政策。“根据该政策,该部门将为特定农村生活问题的研究支付部分费用。到1934年加尔平退休时,该部门已与30个国家的48个机构签订了合作协议。根据这些协议提供的小额赠款,除支持农业院校外,还支持文理学院和师范学院的农村社会研究。由加尔平政策发起的联合研究项目是联邦与大学在社会科学方面合作的早期形式”（Larson et al., 2003:269）。

在《珀内尔法案》通过之前,加尔平将合作研究协议视为培养农村社会学合格研究人员的一种主要方式。“在《珀内尔法案》通过后,社会科学研究理事会在其农业社会和经济研究委员会的敦促下,于1928年拨款设立了一系列农业经济学和农村社会学研究项目。在106项项目中,有17项是用于农村社会学培训的。加尔平曾连续五年担任遴选委员会成员,该委员会每年都会挑选年轻人到一些大学攻读一年或一年以上的农村社会学研究生课程”（Larson et al., 2003:271）。在《珀内尔法案》颁布后不久,第一届农村社会学研究方法研究所也随之成立。“这次为期五天的培训在普渡大学举行,由农村社会组织和机构委员会组织,该委员会是一个由赠地学院和美国农业部组成的委员会,加尔平是其成员之一。23名由珀内尔资助的农村社会学研究人员参加了此次培训。他们来自20个试验站。其他学院和社会机构的研究人员也参加了会议。会议讨论了当前的农村社会学项目,并就人口和农村群体等领域的项目和程序提出了建议”（Larson et al., 2003:271-272）。可以说,在加尔平领导该部门时期,通过广泛与各院校开展合作,极大提升了各院校农村社会学的研究人员数量和研究能力。

第四,该机构在定期评估美国农村社会学研究状况和确定研究重点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在1926—1927年,为评估《珀内尔法案》出台后第一年农村社会学的研究状况,在社会科学研究理事会农业社会和经济研究咨询委员指导下,成立了相关的委员会,加尔平被任命为委员会主席,并发布了评估报告。“在初步报告之后,社会科学研究理事会以社会科学研究专著的形式发布了《美国农村社会学研究》。这些报告分析了27个州的大学和私人机构正在进行的农村社会学研究。分析内容包括研究问题、方法类型、各种支出、从事研究工作人员的学历以及发表的出版物。报告指出了正在进行的研究的范围,并提供了有关研究方法的建议书”（Larson et al., 2003:272-273）。

十年后,当泰勒执掌该部门时,他任命的委员会对农村社会学进行了第二次重大评估。“报告分为三大部分:第一部分从科学角度和推广角度探讨了农村社会学的重要意义;第二部分根据22个州和哥伦比亚特区的25名研究人员提供的信息,介绍了当前农村社会学的研究重点;第三部分面向未来,探讨哪些研究领域在不久的将来是适时的。委员会的报告旨在为即将举行的美国社会学会农村社会学分会年会的讨

论奠定基础”(Larson et al., 2003:273)。此外,“从1928年到1936年,该部门还不时发布与农业人口和农村生活有关的出版物清单,如各州农业学院发行的出版物。从1930年开始,该部门还出版了美国农村社会学人员名录。这些名录从1930年到1941年几乎每年出版一次,1949年再次出版”(Larson et al., 2003:274)。

五、结束语

农业农村社会学是美国社会学中较早兴起的分支学科。本文分析了美国政府机构与早期农业农村社会学兴起的关系。美国政府在内战时期开始干预农业农村事务。内战时期新成立的农业部,尽管其行政长官仅称“专员”,而不称“部长”,也不入内阁,在美国政府中处于边缘地位,但其部门设置很大程度与现代农业学科相对应,其负责人从部门一把手到下属官员均由专家学者组成,并与赠地大学积极联系,促进了《哈奇法案》的通过,也使美国农业教育更进一步形成了科学化和专业的施政风格。在进步主义时期,1908年罗斯福总统成立的“乡村生活委员会”,其成员包括杰出的农业经济学和农村社会学家。该委员会发布的乡村问题报告,不仅直接促进了美国乡村生活的重建,也催生了美国农村社会学的兴起。

在两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国农业部农业经济局下属的“农场人口和农村生活处”,是美国政府为农村社会学专门设立的第一个、也是唯一一个从事农村研究的机构,在美国农业农村社会学的历史上有着独特的地位。该部门存续34年,历经了一战后、大萧条新政时期、二战时期以及二战后四个阶段,在两任具有社会学专业背景的负责人长达32年持续而稳定的领导下,拓展了农场租赁、兼职农业、文化和农业、农业和社区、技术与农业等农业农村社会学研究主题,推动了1925年《珀内尔法案》的出台,将农村社会学确立为农业试验站的一门合法研究学科,广泛采用科研合作协议培养各大院校农村社会学师资力量,定期评估美国农村社会学研究状况,极大促进了美国农业农村社会学的知识生产和学科扩展,也为政府制定农村公共政策提供了重要的数据信息,促进了美国农业农村的进步。

[参考文献]

- 陈焯广,王楠,侯俊丹,2023. 心态与共同体:试析巴特菲尔德的农村改革思想. 中国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5):131-144
- 霍布斯鲍姆,2016. 工业与帝国:英国的现代化历程. 梅俊杰,译. 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
- 李素敏,2004. 美国赠地学院发展研究. 保定:河北大学出版社
- 帕金,米勒,2013. 美国史(中). 葛腾飞,张金兰,译. 上海:东方出版中心
- 谢彤华,2024. 赠地大学与美国农业社会学的发展. 中国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4):184-202
- 原祖杰,2023. 美国工业化转型时期农民状况研究. 北京:商务印书馆
- Baker, Gladys L., 1963. Century of Service: The First 100 Years of the United States Department of

Agriculture. Washington: Centennial Committee

Larson, Olaf F. , Julie N. Zimmerman, Edward O. Moe, 2003. *Sociology in Government: The Galpin-Taylor Years in the U. S. Department of Agriculture, 1919—1953*. University Park: Pennsylvania State University Press

Nelson, Lowry Jr. , 1969. *Rural Sociology: Its Origin and Growth in the United States*.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Government Agencies and the Emergence of Agricultural and Rural Sociology in Early American

MA Xuejun

Abstract The agricultural and rural sociology is an early subdiscipline of sociology in the United States, and its emergence was largely facilitated by the support of governmental institutions. This article examines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U. S. Department of Agriculture (USDA) and its scientific approach during the Civil War, the birth of the Committee on Rural Life (CRL) and agricultural and rural sociology during the Progressive Era, and the professional leadership and knowledge production of the Office of Farm Population and Rural Life during the two World Wars. It analyzes the importance of U. S. government agencies in the emergence of early agricultural and rural sociology. The study points out that the U. S. government did not intervene in agricultural and rural affairs until the Civil War. However, from the very beginning, it formed a scientific and professional style of governance, with experts and scholars serving as heads of departments and agencies. Subsequently, it established a wide range of cooperative agreements with various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to cultivate faculty members in agricultural and rural sociology, to expand the topics of agricultural and rural sociology, and to carry out agricultural and rural services, which not only contributed to the development of early agricultural and rural sociology but also provided important informational data for the government to formulate public policy.

Keywords Governmental agencies; Agricultural and rural sociology; Scientization; Specialization